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

发布者：杨学强

发布时间：2009-10-20 19:43:37 最后更新时间：2009-10-20 19:43:37

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

文图/帅好

此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披露茅台酒与中国大饥荒关系的文章。部分文字 2007 年初首发博客中国，稍后被中国网、搜狐、凤凰新闻网转载，旋即风靡世界华人著名各大论坛；2009 年 3 月部分文字首次刊载国内平面媒体《财富生活》杂志。这里为未删节全文。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 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 2079 吨。其中，出口 139.86 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 700 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 5：1 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 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 1.04 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 20 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 300 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 100 斤左右。换言之，2079 吨茅台酒约等于 20 万人 3 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1. 粮食、生存与统计

在 1959－1961 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1.1 人口：

1959 年仁怀全县死亡 6263 人，其中“疾病”死亡 6130 人，占死亡总数的 97.8%。

1961 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 22.55‰。死亡率为 31.39‰。(2)

1.2 粮食

国家征购：1959 年仁怀粮食总产为 14403 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 7055 万斤；1960 年粮食总产为 11663 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 5506 万斤。

农民口粮：1959、1960 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 350 斤和 334 斤（包含种子、饲料 30 斤）。(3)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 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剔除种子、饲料 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 0.8 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 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 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 1953 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 1962 年至 1964 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 4 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 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 1955-1957 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 1959－1961 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 5 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 1.13 万吨，其中高粱 1085 万斤，小麦 1175 万斤。(4)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1.3 酒与生存：

以 1960 年为例。

1960 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 11 万斤、毕节地区 29 万斤、铜仁地区 10 万斤、黔东南地区 12 万斤、贵阳市 7 万斤、湄潭县 1 万斤、习水县 10 万斤、铜梓县 10 万斤、正安县 1 万斤、赤水县 4 万斤、务川县 1 万斤、煓峰县 1 万斤、仁怀县 20 万斤，共计 117 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 70 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 912 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 1978 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 10 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 年属于全国 8 大旱区之一，1961 年再度成为全国 15 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 5.1 万人。(6)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 1959 年的 12 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

分别调出 10 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 1960 年底人口负增长 121.32‰，全县人口在 1959 至 1960 年一年间减少 41734 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 42624 人，死绝 499 户以上。(9)

调出 29 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 53990 人。(10)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 年 1 月 10 日县委报告， “非正常死亡”5.5 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 3191 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11)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 个县 1959 年 11 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 1960 年 4 月共死亡 12.2 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 20%左右。死绝户 2938 户，离家逃荒 4737 人，孤儿 4735 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 1324 人，关押死亡 200 余人，打伤致残 175 人。(12)

那么，调出 20 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2.故人、故事与档案

2.1 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 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 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 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 2 倍以上 4 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 4 倍以上 8 倍以下罚金”。(13)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 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2.2 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 1959 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 7 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 1959 年 7 月 16 日，仁怀有各种病人 8384 名，其中浮肿 5335 人占总人口 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 9%和 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 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 4 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16)

8 月 4 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17)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 月 17 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 月 1 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 11 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8)

1959 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 820 吨，比“大跃进”之初的 1958 年高出 197 吨，是 1953 年产量的 10 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 120 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 1960 年。

2 月 16 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 16864 名，其中浮肿 9073，严重 6141 人。截止 1959 年 12 月下旬到 1960 年 2 月 14 日死亡 3718 人（其中，路上死亡 217 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 13 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 988 人，实为 2600 人；鲁班报病 296 人，实为 1720 人。(19，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 月 29 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 150 万公斤、茅台原料 250 万公斤。400 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 10 月 30 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 500 万公斤，红薯藤 1500 万公斤，荞杆子 750 万公斤，小米糠 75 万斤，蕨巴 150 万公斤……，共 5000 万公斤。按 30%的出粉率，生产 1500 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 50 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到了 12 月 27 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 1960 年底到 1961 年 6 月需要 360 万斤，饲料用粮 60 万斤。(23)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 1961 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1961 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 月 1 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 月 18 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 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 24342 人，占总人口的 7.4%。其中，浮肿 6399 人，干瘦病 4939 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 6870 人，其他 6134 人。16 日止，死亡 1045 人。

1 月 24 至 27 日：统计 1 月 1 日至 27 日，共死亡 1965 人，比上月上升 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 26744 人。其中，最严重的有 66 个生产队，病人占 30－50%。

2 月 11、12、21 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 10 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 月 4 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 30 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 2.6 万多人下降到 1.9 万多人。

4 月 8 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 1131.6 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 月 26 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 月 5 日：“4 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 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 70 人左右）

5 月 12 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 3543.05 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 910.4 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 9 月完成 70-80%。

7 月 20 日:截止 7 月 15 日有病人 8396 人，其中肿病、瘠病 4890 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2.3 故人

茅台酒前身之一的“荣和酒房”第二代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 1961 年。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 54 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搞什么工作不清楚，解放后一直在仁怀务农。上世纪 50 年代因“反

攻倒算”被判刑 5 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 49 岁。

仁怀茅坝一李姓老人回忆说，“在饿饭那年（指 1959 至 1961 年），我有一岁、两岁、三岁和十一岁的四个孩子死了。前三个太小，没奶吃也没饭吃。 生病就是弄点草药吃吃，不管用就死了。婆婆死在家里，棺材放在别人家，帮忙的人吃不上东西，没有劲把棺材抬回家，只好把婆婆抬过去。有一次，我看见外村一 个二三十岁的壮汉走着走着，靠在我们村的岩头上就死了。我和同村三人抬起把他掩埋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太饿了想出来找些吃的。”

老人老伴补充说，“ 11 岁的，叫荣强。是吃多了枇杷皮，大便拉不出来，用手指抠也抠不出来，死了。”

2.4 茅台为何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 1958 年至 1960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其在生产领域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 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 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 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24)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25)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3. 饿殍、粮库与牲畜

3.1 饿殍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并不难得出一个轮廓。

2005年，杨代绪曾经与其母相互补充印证，对仁怀北部大坝镇当时一个生产队在饥饿三年的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死亡率）的13.68%。(26)

2006年，我曾对仁怀西南部茅坝一个村民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组访问。其中，茅坝一个村民组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有10户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率为13.4%。

水塘某村民组的情况，由李某和几个老人共同扳着手指细数。李某，生于 1936 年，中师文化。清点均记录了户主姓名，结果为：全组约 59 人，死亡 13-18 人。其中，李家死亡 2 人，其他每户至少死亡 1 人，死绝户一家，山后村民路过本村时死亡有 2-3 人。取最低的 13 个人计算，死亡率为 22%。

不同调查者，在不同的地区，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随机抽样比例，这个比例背后的景象，在当年该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仁怀这个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以现有官方有关数据为基准估算死亡，可能在 4 万人上下。

3.2 粮库

茅台酒耗粮与其产地仁怀近水楼台先断粮的关联情况，基本清晰了；还有一个疑问需要验证：那三年仁怀的粮食库存，是否也像水冲过一样颗粒无存？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 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 4293、2705、2310 万斤。(27)三年中，库存最低的 1961 年，竟然也比 1963—1988 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 5132 万斤稻谷，附加税 715 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 82 斤、64.5 斤、39 斤（稻谷）。(28)

需要说明的是，征税要求上交的稻谷，是当地品质最高的粮食；而前文所述的农民口粮，主要以品质较低的杂粮为主。

3.3 牲畜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 1959-1961 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 2242 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 271 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 5 斤；驮物资的马每日 4 斤；牛每日 3 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 1 斤，百斤以下存栏小 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 2 两，奶牛每头 5 斤。另外，1960、1961 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29)

4. 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 年合计发放 132052 元。受助人合计 18557，三年平均每人 7.1 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 2.3 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 年，共发 257873 元，受益人 153930 人，平均三年每人 1.7 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 0.56 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 年三年合计 164527 元，受益人 13695 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 12 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 4 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 13 万元；1959 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 1160 元；1960 年在全市发衣被款 19177 元；1961 年发布票 15000 尺、棉花 1200 斤、衣被款 17000 元。（30）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 年的黑市上，菜油 32 元/斤，猪油 20 元/斤，猪肉 15 元/斤，大米 3 元/斤，面条 3.2 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 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 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埃德蒙 · 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 2000 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